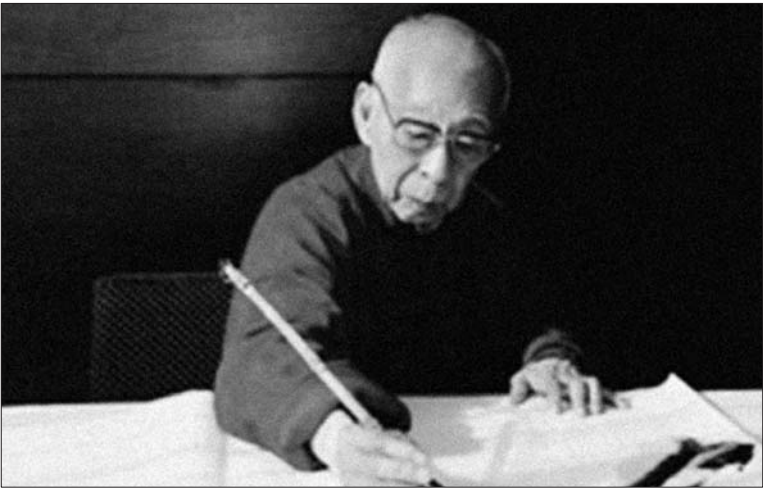




2月6日凌晨，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101岁。饶先生辞世的消息经由媒体发布后，引起了学术圈内外的关注。世人多以“国学大师”的称号赞誉饶宗颐先生，其实他的学术探索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学”，横跨十余个领域，并在文化教育上造诣巨大，著作等身，硕果累累。



## 饶宗颐：融贯古今，超于象外

□黄帅

众所周知，饶宗颐曾长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育人、研究写作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海内外诸多学术奖项和荣誉身份。饶宗颐涉及的学术领域之广泛，让后辈学者难以企及，唯有高山仰止。资料显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目录学、经学、宗教学、楚辞学、中外关系史等多个门类，出版著作70多种，发表文章千余篇，国学的经史子集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而能将古今中外的学术精华融会贯通，更造就了他博大的学问和深邃的思想。

在这里，笔者用的是“古今中外”这个概念，而非“古今中西”。我们今天的学者多将外国学术文化简化为“西方文化”，其实，古印度、中西亚等文化区域的学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饶宗颐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学术渊薮，并努力打通它们和中华文化的关联。饶宗颐有丰厚的家学渊源，父亲饶锬是潮州本土著名学者，南社社员，在家中建有“天啸楼”用于藏书，少年饶宗颐得以自由沉浸在书海里，获取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可惜饶锬英年早逝，42岁就撒手人寰。青年时代的饶宗颐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撰写《潮州艺文志》，直到正式刊发研究成果，这也成为他在学术界的处女秀。

上世纪三十年代，饶宗颐曾任教于中山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从广东文化到更渺远的历史领域延伸，包括清代诗词、西汉文化、中外古文字考辨等等，这些领域看似关联不大，却在他的学术思绪中汇聚在一起。这与他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有关，饶宗颐曾说过：“能够流传至今、被发扬光大成伟大的文艺的，必然是能兼收并蓄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艺术之优秀组成部分，而不是排斥他人，自高自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文艺、文化问题，是进入更开阔学术天地的前提。

在这种治学理念的指引下，饶宗颐的学术研究不仅能于中外学林间纵横捭阖，也能有所节制。这个境界是一般学者达不到的。不少人在学术志业上总有“贪多”心理，其实自己力不能及，或者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学术成就数量，甚至走上了“媚俗”的歧途，违背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饶宗颐的思想始终是清醒的。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研究新莽问题并撰写了《新莽史》，这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但当有出版社想发布其内容时，他却认为，“王莽这

个人不是以德治国，其作为是违反道德的”，而且“出书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

到了四十年代，饶宗颐的研究愈发深入，名作《楚辞地理考》就完成于这段时期。此作和钱穆先生的名著《楚辞地名考》题目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楚辞》。他在著作的自序中称，“楚辞地名，多有未详，依予考之”，而在研究中，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民俗、宗教乃至音乐等问题都成了重新释读《楚辞》的途径，先秦曾经那些神秘而辉煌的文明形象，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得以更精彩地呈现出来。

1949年后，饶宗颐南下香港，长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主要讲授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和古代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的研究更具体系化的特征，并在几个学术界的“难点”上实现了突破。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饶宗颐在甲骨文领域的研究。曾任饶宗颐学术助手的沈建华曾评价，“（饶先生的研究）既是对商代甲骨卜辞的系统研究和学术积累，也可从中看出他对商代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史学观，这都给后人研究留下很多启发和思考”。到了六十年代，其论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曾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儒莲特赏”。事实上，他的甲骨文研究不仅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在海外学界享有盛誉。

其后，饶宗颐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逐渐超出了同代绝大多数学者能达到的程度。他曾在新加坡大学任教，并在当地搜集研究资料，整理为《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他在敦煌学领域也成绩斐然，虽然多数时间他居住在香港，但还是想尽办法去敦煌进行实地考察，在搜集资料后，他能跳出具体领域的局限，以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来解读敦煌文化和与之相关的中国——中亚文明交流的问题。而且，他还进入了古印度文化研究的密林中，虽说跋涉艰难，

却矢志不移，逐渐对梵文和吠陀文化等研究有了独到的心得。

这让笔者总想到另一位古印度文化研究者徐梵澄，他和饶宗颐一样，都为梵文经典中译、乃至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徐梵澄在翻译经典《薄伽梵歌》时，极其艰辛，他曾自称“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虽然饶宗颐很少对外谈论自己学术钻研的“辛劳感”，但从此一例的对照来看，他在研究古印度文化时必然耗费心力不少，而在成果产出后，依然谦虚不言，从不大谈自己的“贡献”。

事实上，这种高风亮节的态度，饶宗颐保持了终生，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学术界内外的赞赏。要看一个学者的学养功底和治学水平，与之同期学者的评价是一个重要参照。季羨林称“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外界也有“南饶北季”的说法，而饶宗颐的谦逊也让世人叹服，他谢绝所谓的“大师”称号，曾直言称自己不是“大师”，而是“大猪”（在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老先生生活中的幽默感和对名利的淡泊感，支撑起百年的沧桑，也让他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实现心灵内外的和睦与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要想了解饶宗颐的历史观，就得进入对他那些大部头的著作进行艰深的阅读。不过，我们也能从他思想的吉光片羽中，获取些许智慧的启蒙。饶宗颐先生曾提出过著名的历史研究法“五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典籍、有文字出土资料、无文字出土资料、民俗学材料以及异邦史料等材料。他在《文化小旅》里还写道：“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或许，正是这样广博而深邃的思考方法，贯通中外古今的研究路径，以及研究对象和自我的同一化，才让饶宗颐的学术更加精进，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 最后一位大儒

□韩浩月

提到饶宗颐，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北钱南饶”“北季南饶”，这也是个有意思的对比，很显然，北边有两位，分别是钱锺书、季羨林，南边只有一位，便是饶宗颐，按照武侠里的说法，饶宗颐先生这是“以一敌二”。

钱锺书说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羨林说“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能得到钱、季两位先生如此高的评价，说一句“饶宗颐是大师中的大师并不为过”。

关于饶宗颐，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不过这是个悬案，先说这句评价——“只要有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有报道说这句话出自金庸之口，也有记录说这是余秋雨说的。不管是谁说的，这个评价没人质疑过，观点就经得起推敲。

因为有了这个评价，可以顺着它思考——现在饶宗颐先生走了，香港怎么办？香港因为饶宗颐的去世，就会变成文化沙漠了？——这已经成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題，人们对于香港与香港文化的评价，并不会因为饶宗颐先生在世与否为标准。事实上对于这位大师的遗忘，是共同的、一致的、无可阻挡的。

被遗忘的不仅是饶宗颐这个人，而是他钻研一生、投入全部精力留下的文化结晶。饶宗颐先生真是全才啊，罗列他涉猎的文化领域：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诗词、书画，会发现多数都是冷门，都是少人继承的事业。饶宗颐曾开玩笑说，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如今游子进入天堂，他身后的背影，显得愈加孤寂。

饶宗颐去世，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再次说起“国学大师”这四个字。曾几何时，一些伪大师、伪国学盛行，使得“国学大师”成为一个有点儿尊严的人避之不及的帽子。当年有人纷纷争抢“国学大师”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的时候，饶宗颐既犀利又幽默地表了态，“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

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羨林、任继愈两位老人去世后，“大师”的帽子纷纷送上，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被学术混子们争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

饶宗颐进一步解释道，“‘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故。

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最有力的批评。

最近这两年，甚嚣尘上的“大师饥渴症”有所缓解，伪国学大师人人喊打。但总是有人忍不住“造大师”的冲动，比如网友曾有这样的提问，某活跃于既能搞音乐、拍电影，又能录制脱口秀、担当综艺节目导师的人，算不算“大儒”？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哪儿还有大儒的产生环境？哪儿还有大儒的课堂？把一名杂家称为“大儒”，表明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已经浅薄到了令人齿冷的地步。

真正的大儒时代早就结束了，如果饶宗颐先生还活着，勉强还能说大儒潜于世，现在这最后一位大儒也走了，我们也就只能在故纸堆里怀念大儒，想象大儒了。

### 【相关阅读】



《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  
陈韩曦 著  
花城出版社



《饶宗颐传》  
严海建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